文章编号：1674－9057(2014)01－0198－09 doi:10.3969/j.issn.1674－9057.2014.01.032

城市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参与机制
——以江苏省海门市为例

朱 梅，魏向东

（苏州大学 旅游系，苏州 215123）

摘 要：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多以旅游地居民总体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各居民群体的差异性。以海门为例，探讨了青少年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和该群体参与城市旅游发展的机制。研究表明：(1)受海门所处旅游地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和青少年个性心理特征影响，受访者积极感知强烈，消极感知不太明显，经济影响感知强于其他感知；(2)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由依托单位、场地、资金、辅导员、管委会、参与活动、规章制度等各项软硬件保障机制组成，是大中尺度旅游地社区参与的有益尝试；(3)该机制运行应形成政府主导、共青团带动、管委会负责、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并实现对青少年的增权。

关键词：城市；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参与机制；海门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国内外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领域学术成果颇丰，但学者们常以旅游地居民总体为研究对象，青少年等特定居民群体研究相对缺乏。而学术界对青少年旅游的探讨多从旅游者层面出发，居民层面的研究论述有限，缺少对青少年居民旅游参与的深入探索。本文侧重于城市旅游地青少年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参与机制研究，以期为相关实践运作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1 相关研究综述与研究设计

1.1 相关研究综述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内容包括感知评估标准和内容探讨[1－2]、基于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和居民类型分析[3－5]、感知的空间差异及历时性探讨[6－7]、研究进展回顾[8－9]等。国外研究注重相关学科理论的运用和解释，且有不少针对特殊旅游产品的探索[6]，而国内研究大多借鉴国外理论，缺乏合理而有新意的理论解释[9]。国外研究对象涉及到景区[10]、村镇[3]、城市[11]、州（省）[4]等多尺度旅游地居民，并有少量特定居民群体细化探讨[10]，而国内研究集中在古村镇[7,12]、古民居[2]、民族地区[5]、山岳风景区[13]等中小尺度旅游地，偏重居民总体分析。事实上，随着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将旅游地居民看作一个理想的均质社区来整体考虑的做法值得推敲。由于性别、年龄、职业等的差异，社区内各群体间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细分居民群体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有待加强。

在各居民群体中，青少年大多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参与意识强，对当地旅游业发展有着独特的责任感与热情，他们的态度代表着公众旅游感知的趋势与走向，相关分析对旅游地发展具有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国内外有关青少年的旅游学术探讨，多从旅游者层面展开。国外研究内容较广泛，涵盖旅游心理[14]、旅游行为[15]、主客关系[16]、旅游危险感知[17]、旅游满意度[18]、出游影响因素[19]、旅游疾病应对[20]等多个方面；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以旅游心理[21]、旅游行为[22]和市场开发[23]为重点。对居民层面的研究十分有限，零散分布于社区旅游文献中，例如，社区调研有时将青少

收稿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34）；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SJD630030）
作者简介：朱 梅（1983—），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城市旅游和旅游社区，mostmagic@163.com。
引文格式：朱梅，魏向东. 城市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参与机制——以江苏省海门市为例［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4，34（1）：198－206.

年作为居民的一份子纳入调查范围[2,24-25]，但一般不做针对性分析；旅游负面影响探讨偶尔提及当地青少年，包括致使其辍学、吸毒、喝酒、闲荡、犯罪等[26-27]；社区参与模式研究偶见只言片语论及青少年旅游参与的途径，包括提升其保护当地文化氛围的意识[28]，让其参加旅游表演、工艺品生产销售或持有股份以获取经济收益[29-30]，通过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其更好地接受基础教育、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获得奖助学金等[31-32]。为此，有必要对青少年居民旅游参与作系统思考，尤其在中国这样的青少年人口过亿的国家，青少年是社区中重要而又独立的群体，旅游参与是实现对其公民教育的一种方式。本文以城市为切入点，以新兴旅游地海门为案例地，分析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进而探讨该群体参与城市旅游发展的机制，旨在为大中尺度旅游地社区参与提供有益探索。

1.2　研究设计

学术界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衡量维度和指标已形成较多共识，本文参考了 Lankford S V 等[1]、Ap J 等[8]、卢松等[7]、李德山等[33]、叶俊[34]等的研究成果，结合海门实地调研和访谈，设计了包含 3 大类 26 小类指标的“城市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调查问卷”（表 1）。问卷使用 Likert 量表法测定被调查者态度，即用分值 5、4、3、2、1 代表非常赞同、赞同、中立、反对、极力反对。长期以来青少年年龄缺乏统一界定，社会各界众说纷纭[35]。在 3 个亚阶段中（青少年心理学家通常将青少年划分为 3 个亚阶段：青少年早期 11～14 岁，青少年中期 15～18 岁，少年晚期 18～21 岁，参见文献［36］），不少学者认为早期青少年

表 1　海门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汇总

Table 1　Adolescent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in Haimen

感知类别（Cronbach's α 系数）	积极影响 均值	被调查项目	赞同率/%	中立率/%	反对率/%	均值	标准差
经济影响（0.802）	4.22	促进经济发展	86.43	12.97	0.60	4.29	0.72
		提供就业机会	80.64	18.96	0.40	4.21	0.76
		提高财政收入	82.24	16.97	0.80	4.22	0.78
		增加居民收入	78.84	19.36	1.80	4.18	0.82
社会文化影响（0.815）	4.13	提升居民本土文化认识	80.64	16.77	2.59	4.10	0.82
		促进居民思想更新开放	80.04	17.76	2.20	4.11	0.81
		加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	83.63	14.77	1.60	4.19	0.79
		丰富当地的文化活动	79.04	17.96	2.99	4.12	0.86
环境影响（0.852）	4.11	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81.84	15.57	2.59	4.16	0.83
		有效保护开发自然环境	77.45	18.96	3.59	4.11	0.88
		保护古建筑和历史遗迹	80.44	16.37	3.19	4.14	0.85
		改善基础设施	81.64	16.57	1.80	4.15	0.80
		居民环保意识增强	72.85	21.96	5.19	4.01	0.93
感知类别（Cronbach's α 系数）	消极影响 均值	被调查项目	赞同率/%	中立率/%	反对率/%	均值	标准差
经济影响（0.802）	3.17	使价格上涨、通货膨胀	35.93	42.32	21.76	3.20	1.13
		使居民贫富两极分化	38.52	39.32	22.16	3.21	1.11
		仅使少数人受益	40.32	34.93	24.75	3.22	1.15
		导致物资和服务短缺	30.14	42.32	27.54	3.06	1.12
社会文化影响（0.815）	2.83	打搅居民日常生活	26.95	36.73	36.33	2.91	1.13
		增加犯罪事件	25.55	35.13	39.32	2.81	1.19
		使社会风气下降	24.15	30.74	45.11	2.73	1.17
		使传统文化商业化	28.14	32.53	39.32	2.85	1.20
环境影响（0.852）	3.13	造成交通拥堵	39.72	34.53	25.75	3.17	1.13
		恶化卫生状况	39.52	32.53	27.94	3.15	1.20
		破坏动植物栖息环境	38.52	33.33	28.14	3.12	1.17
		增加大气和水污染	39.92	33.33	26.75	3.15	1.18
		使游憩休闲设施紧张	33.93	36.33	29.74	3.06	1.13

注：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

与儿童有交叉，晚期青少年与青年有交叉，而 15 ~ 18 岁年龄段人群的归属争议较小[35, 37]，他们从学龄看主要处于高中阶段[38]。基于城市居民研究视角，考虑到职业高中非本市区生源相对较多，为集中获取数据，调研组将调查对象确定为普通高中 15 ~ 18 岁的市区学生。调查在某高中进行，该校是海门市区全部 3 所普通高中里规模最大的 1 所，受访者占在校生总数近 1/3。调查共发放问卷 550 份，回收 515 份，回收率 93.64%，其中有效问卷 501 份，有效率 91.09%。调查范围较小，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门青少年居民的态度。数据处理方面，统计分析工具为 SPSS16.0 和 Excel 软件，首先采用内部一致性评价系数 Cronbach's α 作信度分析，一般认为该系数在 0.8 以上，数据可靠性较高[39]，然后计算 26 类影响指标的均值、标准差、赞同率、中立率和反对率。均值代表居民对被调查项目的整体态度，数值越大，认同度越大；标准差代表被调查项目各数据偏离算术平均值的程度，数值越大，离散程度越高；赞同率、中立率、反对率分别代表持赞同（含非常赞同和赞同）、中立、反对（含极力反对和反对）态度的被调查者占总数的比例。

2 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2.1 城市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析

2.1.1 *旅游影响感知综合比较* 根据信度分析结果（表 1），总体 α 值在 0.9 以上，各大类 α 值均在 0.8 以上，说明问卷整体设计的可信度较好，依此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靠的，可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三类积极影响感知均值都超过 4，表明青少年期的个体开始承担一些成人的角色，关注地方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对旅游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动作用具有强烈认同感，这也折射出后起旅游城市居民渴望与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普遍心理。与社会文化、环境积极影响感知相比，经济积极影响感知均值略高，符合巴特勒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处于发展初期的旅游地，居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更强，也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居民对经济方面的介入和参与是直接的、最容易感受到的，而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感知具有内隐性、过程性和滞后性[8]。

消极影响方面，三类感知均值约为 3，被调查者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感知不太明显，这主要因为海门旅游业尚未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旅游负面效应不突出，此外也与青少年群体积极向上、正面阳光的个性特征有关。经济、环境消极影响感知均值超过 3，被调查者持中立偏肯定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不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工作，无法在城市旅游发展中直接获益，而海门以滩涂、蛎蚜山、江海风光等自然生态类旅游资源为主，环境保护尤为重要。社会文化消极影响感知均值不足 3，被调查者持中立偏否定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海门的游客大多来自周边地区，主客文化距离近，对本地社会文化冲击小，另一方面和青少年人格结构中的宜人性因素有关[39]，他们豪爽、真诚、博爱，欢迎旅游者的到来，愿意与旅游者和谐相处。

2.1.2 *经济影响感知分析* 旅游经济影响感知 α 值为 0.802，下属 8 小类指标设计是科学的。从各指标数据来看，标准差数值较小，在 1 附近波动，表明各指标均值能较好地代表被调查者群体的态度。积极感知均值都大于 4，消极感知均值约为 3，可见青少年大多认为海门旅游在经济方面的正面效应强于负面效应，主要原因在于海门正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且靠近上海等主要客源城市，居民较认同旅游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

积极影响感知方面，各指标赞同率均超过 75%，中立率超过反对率，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余 3 项指标相比，“增加居民收入”的反对率超出 2 倍，中立率略高，赞同率略低，体现出青少年对于旅游经济发展能否直接惠民的隐隐担忧，此点也得到了“仅使少数人受益”项的佐证，该指标在 13 个消极影响指标中赞成率最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地旅游发展甚少给青少年带来直接福利，该群体对旅游业的回报感受不深，另一方面则是海门经济发展水平逊于大多数长三角城市，以 2011 年为例，海门所属的南通市人均 GDP 在长三角 16 市中仅居第 12 位，当地居民提高收入的愿望较强烈。消极影响感知方面，除“仅使少数人受益”外，其余指标赞同率均低于 40%，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不认同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4 项指标中，“导致物资和服务短缺”的赞同率最低，中立率最高，反对率也最高，可见青少年普遍认为发展旅游不太影响本地物资和服务正常供应，这从侧面反映出海门物产丰饶、商贸繁荣、人力资源供给充足，能有力保障旅

游经济运行。

2.1.3　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分析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α 值为 0.815，下属 8 小类指标合理有效。由各指标数据可知，标准差数值较小，各指标均值代表性较好，积极感知均值都大于 4，消极感知均值都不足 3，青少年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面感知普遍强于负面感知，这主要与海门所处的旅游地发展初级阶段有关，居民对旅游业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消极效应尚不敏感。

积极影响感知方面，各项指标赞同率高于 75%，中立率超过反对率，可见被调查者大多认同旅游业的正面社会文化效应。诸项指标中，“加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的赞同率最高，中立率最低，反对率也最低，说明青少年看重旅游业增强对外交流的作用，这与该群体渴望了解外界和被外界了解的心理特点有关，也与海门作为长江入海口而经历的几经沉浮、与大陆时连时断的历史变迁有关。消极影响感知方面，各指标赞同率低于 30%，均值不足 3，表明被调查者普遍持中立偏否定的态度。其中，“使社会风气下降”赞同率最低，中立率也最低，而反对率则最高，体现出青少年居民对当地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的信心，此点不无道理：海门曾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称号，社会文化环境较好。

2.1.4　环境影响感知分析　旅游环境影响感知 α 值达到 0.852，下属 10 小类指标能较好反映所在维度。据各指标数据，较小的标准差数值反映出指标均值良好的代表性，积极感知均值都略高于 4，消极感知均值都略高于 3，表明青少年对旅游环境正面影响感知较强烈，负面影响感知不太明显，这也与海门旅游发展初级阶段有直接关系，居民对旅游业的环境负面影响体会不深。

积极影响感知方面，5 项指标赞同率均高于或接近 75%，中立率超过反对率，表明多数被调查者支持旅游业的正面环境效应。较之其余指标，“居民环保意识增强”的赞同率略低，中立率偏高，反对率也略高，体现出被调查者担心过度的旅游开发、旅游者的放任行为会破坏环境、对居民有负面示范效应，而多年来“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也增强了居民的这种心理，他们珍惜海门现有的良好环境。这也和“造成交通拥堵”、“恶化卫生状况”、“增加大气和水污染”、“破坏动植物栖息环境”的赞成率位于 13 个消极影响指标前列（仅次于“仅使少数人受益”）的结果相一致。消极影响赞同率方面，4 项指标接近 40%，1 项指标低于 35%，可见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业发展对交通拥堵、卫生恶化、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污染增加的影响有限，对游憩设施紧张的影响较小。各指标中，“加剧游憩休闲设施紧张”赞同率最低，中立率和反对率最高，结合积极影响感知中“改善基础设施”反对率最低的情况，可以推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发展旅游不会造成居民游憩设施紧张，并且还能促进其完善。

2.2　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构建

青少年正值从依附向独立过渡的阶段，无论个体还是集体层面上，都处于无权或弱权的状态，缺乏资源、机会、话语权与能力。这种状态是可以改变的[40]，构建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是途径之一。对城市旅游地来说，青少年旅游参与是社区参与的有益尝试，并且青少年在数年后将成为社区的主体，当前的探索对于社区旅游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关乎社区与旅游发展的长期良性互动。对青少年居民来说，参与城市旅游意味着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旅游成果的分享，其实质是获得了学校教育之外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该群体透过自我实践提升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和政治能力，通过人际互动增强社会资本和社区归属感。此外，青少年居民具备了一些有利的特质，如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新事物、自我意识成长迅速、渴求发出声音和表达意愿、可自由支配时间长达 180 d 等，能够保证良好的旅游参与效果。

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是指使青少年居民成为城市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并享受旅游所带来益处的各项软硬件保障的集合。作为新事物，该机制创建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城市对其构成要件也将各有侧重，但不能背离以下思路：（1）紧扣青少年特性，即充分考虑该群体的认知行为特点和可塑性，增强相关工作的感召力；（2）弘扬本地旅游文化，即构建本地历史、文化、地理、民俗宣传平台，强化该群体的归属感；（3）实现“有意义的参与”[41]，即形成符合青少年意愿的制度化深层参与，不断丰富活动样式，避免形式化和表面化；（4）注重权利与义务对等，即让青少年享受相关福利的同时，为城市旅游发展承担力所能

及的责任。本文引入增权思路，借鉴 Scheyvens R 提出的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 4 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42]，构建了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框架（图 1）。以增权为导向的青少年旅游参与，是青少年居民增加个人和集体在旅游发展中的权能和资源的过程，涉及权利自主、能力提升、参与决策、人际关系调整、经济环境改善等多方面，其目标在于激发青少年居民的主动性，促进旅游开发中的社会自主和社区自治。

2.2.1 *硬件机制* （1）依托单位。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是因旅游发展而作为福利提供给社区青少年的，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公益性。其受众是广泛的青少年群体，给予每个个体的机会是平等的，体现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特征，因此必须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应增强青少年居民在旅游开发方面获取信息、参与决策、分享利益的权利：通过专门的组织机构定期向青少年公开旅游发展资讯、选派青少年代表直接参与当地旅游决策，并从制度上确保青少年的参与权利和机会，以实现其政治增权。此外，通过各项活动，促进青少年对当地文化和自身社会身份的理解，强化群体内的互动与凝聚力，提高对该群体的经济资助力度，实现其心理、社会和经济增权。遵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原则，该机制构建可依托如下单位：① 旅游行政部门。就海门而言，当地暂无独立的旅游管理机构，分管旅游工作人员配备不足，故应成立“海门市旅游局”，统领全市旅游业发展，并创建政策、舆论、投入、监管等导向机制，增加青少年旅游参与的社会资本，提升该群体的权力和能力。② 共青团市委。共青团在帮助青少年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从增权角度推行青少年参与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海门团市委可通过政府委托或授权形式，承接部分青少年旅游参与事务，建立旅游社会教育、娱乐体验、公益会展等公共服务机制，实现“体制内”向“体制外”的延伸。③ 中学及大中专院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在校生占同龄青少年人口的绝大多数[43]，可见学校是青少年旅游参与的基层阵地，应发挥其权威作用和动员能力，构建以校团委、团支部、学生会、班级为单位的交叉式覆盖的活动开展机制。

（2）场地设施。青少年旅游参与活动开展大致可利用两类场馆：① 各类青少年宫。作为青少年社会文化教育的校外机构，青少年宫为青少年业余活动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海门市少年宫规模较小，以各类培训班为主体，设施供给有限，建议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并将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两个场所辟出专门的青少年旅游参与基地，基地设置办公室和各类活动室，并可共享青少年宫的通用设施。② 其他公共场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影剧院、图书馆、旅游景点等社会场馆，能促进青少年了解本地旅游文化、提升地方依恋感。海门应根据实际需要，在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一批公共文化设施。为推动社区发展和实现社会增权，以上场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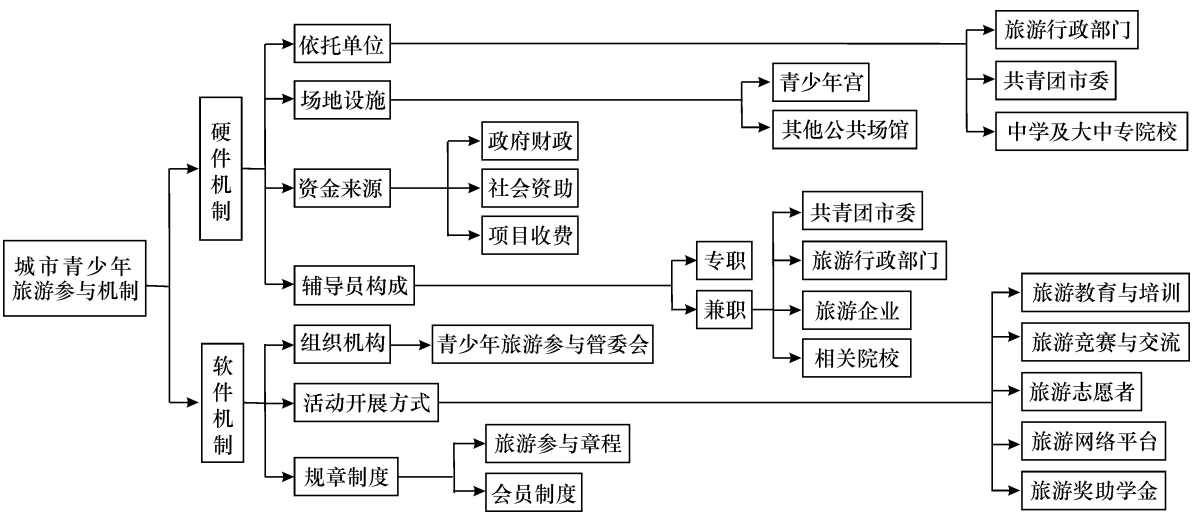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adolescent residents tourism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学校等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建设与维护费用，可部分来自于地方旅游收益。场馆开展青少年旅游参与活动，主要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补助，也可向青少年收取少量费用，此举有利于调控客流量，也符合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3）资金来源。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的新生性和公共性，决定了实现其适度超前供给的主要筹资主体是政府，其重要资金来源为旅游税收收入。旅游经济收益被广大社区青少年所分享，是经济增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若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既会加重政府资金负担，又会因投入不足而发展受限，因此必须多渠道筹资，并强化资金监管，保证资金的合理投放、收支透明和使用效益。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① 政府财政。前期建设与基本运营的投入有赖于海门政府财政，一方面通过政府拨款设置专项经费，金额视机制发展需要和旅游业盈利状况而定，另一方面政府筹集部分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青少年宫场地建设，这也符合其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宗旨。② 社会资助。社会资助是该机制深化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应创建海门青少年旅游参与公益基金会，鼓励旅游企业、私人或其他单位捐助，实现社会共建。③ 项目收费。项目收费是该机制的辅助性资金来源，包括会员费、门票费、参赛费、广告费、活动冠名权费等，除赞助单位承担的广告费、活动冠名权费等外，其余费用尽量不收或少收。

（4）辅导员构成。辅导员引导有利于青少年内在增权。辅导员在工作中应做到：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唤醒青少年群体对自身权力的意识，提升其旅游参与能力，协助其争取合理资源，以改变其缺少权力的现状；突破以往将青少年看作教育、教化对象的做法，通过各类旅游参与活动加强青少年同辈之间、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以提高社区整合度，促进社会增权；让青少年充分了解本地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魅力，提升其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实现心理增权。辅导员的产生途径有：① 公开招聘专职人员。招聘具有旅游或青少年专业知识的职工，应聘者一旦被录用，即签订劳动合同。② 鼓励志愿者参与兼职工作。志愿者可来自海门共青团市委、旅游行政部门、旅游企业、相关院校等单位，并建立登记注册制度，提供合法性身份认同。所有辅导员均经培训后持证上岗，依工作量获得补贴，实行考核评定和人事激励政策。此外，还应发挥毗邻上海的地缘优势，定期邀请旅游专家前来培训辅导，以弥补当地师资不足，并为机制运行提供指导。

2.2.2　软件机制　（1）组织机构。在机制建立初期青少年旅游参与意识较低的情况下，构建完善的组织领导机构非常重要。三类依托单位中，作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公共管理的范例，共青团组织在青少年事务中的实践探索较多，若成为本机制的带动单位，将符合全球性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变的趋势。由此海门可组建团市委带动型青少年旅游参与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宣传部、培训部、比赛部、实践部和财务部等一室五部，请三类依托单位的主要领导兼任管委会领导。内设机构成员一部分为依托单位或面向社会聘请的员工，另一部分为能够表达群体诉求和利益的青少年代表。管委会办公地点设在青少年旅游参与基地，全面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工作，落实场地、资金、人员、活动、制度等具体事宜，并为青少年搭建话语平台，促进其政治增权。青少年作为社区居民中较难自助的群体，掌握的各类资源有限，缺乏属于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在增权过程中，管委会应担当联系人的角色，通过网络、内刊、座谈会等方式建立面向青少年的旅游信息公开与协商机制，增加其信息量，并适当考虑和采纳青少年的意见，提升其发言权和影响力。管委会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权利，有能力影响地方政策，获取社会支持，其介入能增强青少年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和利益分享权[44]。

（2）活动开展方式。青少年旅游参与，不是单纯的经济受益，而是在旅游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维护等方面的全面参与和受益，最终带动城市旅游业和青少年事业双提升。开展主题突出、形式丰富的活动，能加强海门青少年多方面的旅游增权，主要方式如下：① 旅游教育与培训。采用讲座、论坛、读书会、沙龙、特刊等形式向青少年传授地方文化和旅游知识，提升其地方依恋感，培养其旅游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心理增权。② 旅游竞赛与交流。通过海门旅游知识竞赛、旅游形象征集、导游讲解比赛、线路设计创意大赛等比赛，以及夏令营、冬令营、拓展训练等旅游交流活动，提高青少年对海门旅游的了解度与支持度，深化心理

增权。③ 旅游志愿者。组建青少年旅游志愿者服务站，推出景点义务讲解员、环境保护推广员、旅游交通协管员、旅游信息咨询员、旅游小记者、旅游社区宣传员、助老帮残服务员等一系列活动，鼓励青少年利用夜晚、周末或节假日时间服务海门居民和旅游者，在为地方旅游服务中强化群体向心力，实现社会增权。④ 旅游网络平台。在旅游局网站的基础上建立旅游建议与投诉网络论坛，倾听青少年居民对海门旅游业的看法，实现与他们的互动、沟通，确保他们的发言权和建议权，推动政治增权。⑤ 旅游奖助学金。在相关学校设置各类旅游奖助学金，颁发给学习成绩优异、创新能力突出或者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少年学生，使他们在经济上直接受益，实现经济增权。

（3）规章制度。有效的青少年旅游参与，既是青少年个体参与意识、能力提升的过程，又是青少年群体政治权力增加的过程。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边缘性较强，必须形成明确的支持性制度，否则该群体将不可避免地被消权。作为新兴旅游地，海门旅游立法任重道远，为维护本机制运行和规范管理，至少应建立以下制度：① 旅游参与章程。明确青少年参与行为规范、管委会岗位责任、资金管理办法、培训和收费标准、场地开放时间、辅导员聘用办法、奖惩激励方案、区域内城乡协调原则等内容，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② 会员制度。有效制定会员章程，采取个人会员和集体会员两种制度，海门适龄青少年居民可以个人名义申请入会，也可由所在学校统一代为申请入会，会员享有优先参加各类旅游参与活动的权利。当然，政治增权仅靠基层政府难以完成，从长远看来还有赖于国家从政治或法律层面的授权，才能切实保障青少年居民参与旅游的权益[44]。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综观各感知指标数据，积极影响类指标均值超过 4，消极影响类指标均值在 3 上下波动，两类指标标准差数值均较小，其中正面影响类指标更甚，表明本次调查结果代表性较好，青少年居民积极影响感知强烈，普遍认同旅游业给海门带来的正面效应，消极影响感知则不太明显，群体内部态度稍有分化。这与多位学者对成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结果相似[2, 7, 12, 33]。可能的原因是：其一，青少年赖以生活、学习的环境由成年人提供，成年人如家长、老师等对事物的看法常常会迁移到青少年的世界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其二，青少年的从众心理倾向较强，易受社区主流观点影响，致使该群体的感知与主流社会趋同。

（2）城市发展现状与实情是影响海门青少年居民旅游感知的首要因素。被调查者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经济影响感知强于其他感知，归根到底是由海门所处的旅游地发展初级阶段决定的。此外，海门发展中的部分因素增强或削弱了被调查者的某些态度，致使各指标得分存在差异，如距主要客源市场较近、生态旅游资源占主导、区域旅游竞争激烈、经济发展相对弱势、成陆历史独特、城市环境与文化良好、物资与人才供给充足等。

（3）青少年群体的个性心理与人格发展特征是影响海门青少年居民旅游感知的重要因素。青少年期的个体认知逐渐成熟，人格发展具有社会性，开始关心当地社会现实问题，而我国青少年价值取向中的社会文化特点尤为明显，他们更看重国家与集体利益[36]23，大多具有积极的价值观。在本次调查中体现为问卷有效回收率高，且受访者对海门旅游影响正面感知强烈。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认知受社会（包括集体、朋友、父母、权威等）的影响[36]425－426，本次调查也显示受访青少年的某些感知与海门居民的普遍心理相吻合。青少年能够相对辩证地看待事物，认知不再像儿童那么绝对化，这使得 26 小类指标数据不尽相同，海门青少年居民在总体感知一致的基础上，表现出对某些指标或指标类别的偏重，如经济正负面影响、环境负面影响、增加居民收入、加强与外界文化交流等。

（4）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是促进海门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青少年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城市社区旅游参与的有益尝试。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城市旅游业的持续发展需要社区参与，而作为大中尺度旅游地，城市难以骤然效仿村镇全民、全过程的社区参与模式，为此小范围试点十分必要。本次调查中，“增加居民收入”项的高反对率和“仅使少数人受益”项的高赞成率反映出青少年居民对旅游惠民机制的关注及对其现状的不满，今后可在该群体中试行旅游参与机制。根据勒温的场论，青少年作为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边

缘人”，有扩大生活领域、寻找社会寄托、承担社会责任的需求[36]50，旅游参与机制的推行能帮助他们拓宽社交空间、丰富业余生活、增强主人翁精神，符合该群体成长与成才的需要。

（5）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由相关软硬件保障机制组成，应紧扣青少年特性，弘扬本地旅游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对等，实现符合青少年意愿的制度化深层参与。青少年是未来的劳动者，正值身心迅速发展的黄金阶段，同时又处于相对敏感的时期，确保其公民教育权利尤为重要。作为一种公民教育模式，青少年旅游参与可以培养该群体的公民身份认同、公民品格与承担公民权责的能力，为其将来参与公共生活、管理国家与社会作准备。

（6）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应形成政府主导、共青团带动、管委会负责、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并实现对青少年的增权。该机制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共青团、管委会等第三部门，院校、公共场馆等社会机构，企业、志愿者等社会要素，以构建集聚人力、财力、物力的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目前青少年群体权力普遍被弱化，常常被动遵从其他社会群体安排，应通过内在和外在增权，助其在旅游地发展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益。

3.2　局限与后续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仅对 1 所高中 15～18 岁的学生发放了问卷，样本容量有限，在全面揭示海门青少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方面显得有些不够全面，后续应扩大调查范围，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2）所提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仅限于概念性框架，且建立在新兴旅游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对其他阶段旅游地的研究，其操作性、普适性需要今后进一步分析。

作为新事物，城市青少年旅游参与机制的研究尚未展开，在下列方面有待深化：（1）后续评估制度研究，包括参与机制的评估标准、评估手段、评估程序等，并注意吸纳青少年的意见和看法；（2）市场化运作研究，引入购买、外包、招标等市场竞争手段，实现参与机制的私人非经营部门管理或参与管理；（3）细分研究，结合早、中、晚期青少年感知的差异和特点，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参与机制；（4）不同旅游地比较研究，对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新兴旅游地与成熟旅游地等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参与机制作多方面对比分析；（5）动态研究，对参与机制做长期跟踪分析，掌握青少年旅游参与行为的动态变化特征；（6）多样化增权模式研究，从个体、社区、国家等多个层面探讨各种可能的青少年居民旅游增权途径。

参考文献：

[1] Lankford S V, Howard D R. Developing a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 (1): 121 – 139.

[2] 李婷婷, 骆培聪. 福建永定土楼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 (2): 135 – 145.

[3] Horn C, Simmons D. Community adaptation to tourism: Comparisons between Rotorua and Kaikoura, New Zealand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 (2): 133 – 143.

[4] Davis D, Allen J, Cosenza R M.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 (2): 2 – 8.

[5] 唐晓云, 秦彬, 吴忠军. 基于居民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开发影响评价——以桂林龙脊平安寨为例 [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2010, 30 (3): 461 – 466.

[6] Lee C K, Back K J. Examining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impact, benefit, and support for casino development based on 4 year longitudinal dat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 (3): 466 – 480.

[7] 卢松, 张捷, 苏勤.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景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9, 28 (2): 536 – 548.

[8] Ap J, Crompton J L.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 37(2): 120 – 130.

[9] 王莉, 陆林. 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05, 20(3): 87 – 93.

[10] Tomljenovic R, Faulkner B. Tourism and older residents in a sunbelt resor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 (1): 93 – 114.

[11] Uriely N, Israeli A A, Reichel A. Heritage proximity and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 (3): 859 – 861.

[12] 郭伟, 柳玉清, 张素梅, 等.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实证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 (5): 57 – 61.

[13] 潘立军, 刘喜梅. 宗教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南岳为例 [J].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 (32): 16038 – 16041.

[14] Kim K Y, Jogaratnam G. Travel motiv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2003, 13 (4): 61 – 82.

[15] Carr 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ehaviou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young tourist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 (3): 321 – 325.

[16] Heuman D. Hospitality and reciprocity: Working tourists in Dominica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 (2): 407 – 418.

[17] Larsen S, Brun W, Øgaard T. What tourists worry about –

Construction of a scale measuring tourist worr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 (2): 260 – 265.
[18] Uriely N, Reichel A. Working tourists and their attitudes to host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 (2): 267 – 283.
[19] Sellars A. The influence of dance music on the UK youth tourism market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8, 19 (6): 611 – 615.
[20] Torrell J M R, Aumatell C M, Ramos S M, et al. Reduction of travellers' diarrhoea by WC/rBS oral cholera vaccine in young, high-risk travellers [J]. Vaccine, 2009, 27 (30): 4074 – 4077.
[21] 蒙睿. 我国青少年旅游网络建构的初步探讨 [J]. 旅游学刊, 2001, 16 (1): 47 – 50.
[22] 刘嘉纬,蒙睿. 中日大学生旅游行为比较研究——以昆明、东京部分高校为例[J]. 旅游学刊,2006,21(7):79 – 82.
[23] 陈景辉, 成艳彬. 孔子的旅游思想与当代青少年旅游市场的开发 [J]. 社会科学家, 2002, 17 (6): 39 – 42.
[24] Lepp A.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village, Ugand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 (3): 876 – 885.
[25] 颜丽虹,程道品. 基于 SPSS 的工业旅游感知分析——以柳州市为例[J]. 桂林工学院学报,2005,25(3):398 – 401.
[26] Sindiga I.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Kenya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Waswahili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 (6): 425 – 432.
[27] Nickerson N P. Tourism and gambling content analysi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 (1): 53 – 66.
[28] Besculides A, Lee M E, McCormick P J.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cultural benefits of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 (2): 303 – 319.
[29] Tao T C H,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 (1): 90 – 98.
[30] 孙九霞, 保继刚.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 阳朔遇龙河案例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7 (1): 85 – 92.
[31] 左冰, 保继刚. 制度增权: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 [J]. 旅游学刊, 2012, 27 (2): 23 – 31.
[32] 叶春, 陈志永, 李渊妮.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行动方案设计 [J]. 贵州农业科学, 2009, 37 (8): 255 – 258.
[33] 李德山,韩春鲜,杨玲.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综述及中外研究比较[J]. 人文地理,2010,25(5):142 – 147.
[34] 叶俊. 基于社区的旅游规划方法 [J]. 热带地理, 2009, 29 (2): 161 – 166.
[35] 莫晓春. 关于“青少年”年龄界定问题的思考 [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9 (2): 38 – 40.
[36] 张文新. 青少年发展心理学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7, 23, 425 – 426, 50.
[37] 胡玉坤, 郑晓瑛, 陈功, 等. 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国际政策举措与中国实证依据 [J]. 青年研究, 2011 (4): 1 – 15.
[38] 王振勇, 黄希庭, 支富华. 高中生理想人格结构分析 [J]. 心理科学, 2002, 25 (5): 562 – 564.
[39] 卢纹岱. SPSS for Windows 统计分析 [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518.
[40] 李小燕. 社工在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增权”中的多重角色 [J]. 社会工作, 2008 (1): 43 – 45.
[41] 卢德平. 论青少年参与理论与案主优势视角的关联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7 (10): 61 – 63.
[42] 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1999,20(2):245 – 249.
[43] 张华. 构建中国特色青少年事务管理体制的战略思考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3): 43 – 48.
[44] 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J]. 旅游学刊, 2008, 23 (4): 58 – 63.

Adolescent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an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the city

—A case of Haimen in Jiangsu

ZHU Mei, WEI Xiang-dong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Overall residents are usually the object to study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while study less the difference among resident groups. From Haimen, adolescent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economic, soci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mpacts, and tourism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framework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e to the early tourism life-cycle stage of Haimen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the responden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aware of positive tourism impacts than negative impacts, and their perception on tourism economic impact is stronger than others. (2) The adolescent residents tourism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composed of different software and hardware guarantee factors, such as supported departments, sites, funds, instructor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participation activities, and regulations, is a valuable experiment for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large and medium yardstick tourist destination. (3) This mechanism should be operated by a government dominant, Communist Youth Leagu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multi-bodies involved cooperation mode, and empowerment accomplished for adolescent residents.

Key words: city; adolescent residents; resident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Haimen